

社会保障研究

城镇低收入群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池振合¹，杨宜勇²

1.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45；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低收入群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首先对“低收入”概念进行了界定，发现“低收入”就是“相对贫困”，所以低收入群体也就是相对贫困群体。然后，文章利用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相对贫困进行了测算。通过测算结果的分析发现，贫困线选择在贫困测算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对贫困指数的大小、离散程度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本文对北京市相对贫困率变动进行了分解并发现收入增长是导致北京市相对贫困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北京市贫困线的上移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长则导致相对贫困率增加。与此同时，贫困线选择会对贫困线、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对相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大小产生影响。

关键词：低收入群体；相对贫困；贫困测算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 (2013) 02-0100-08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Low Income Households and Its' Changing: Using Beijing's Urban Household Survey Data

CHI Zhen-he¹, YANG Yi-yong²

-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45, China; 2.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National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people with low income is a valuable research topic. Firstly, the paper defines the low income conception and finds that the “low income” is the “relative poverty”, so the people with low income are the people in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n, the paper measures relative poverty using Beijing's urban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hoosing of the poverty line is important in the relative poverty measurement, because it has great pact on the poverty indexes and

收稿日期：2012-10-23；修订日期：2012-12-25

基金项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zy017）。

作者简介：池振合（1981-），山东莱芜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贫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its' variances. Meanwhile, the paper decomposes the changing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rate and finds that the income growth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reducing of the relative poverty rate and the risings of the poverty line a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 drive up the relative poverty rate in Beijing urban areas. Meanwhile, if the poverty line is different in the poverty measure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poverty line, income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o relative poverty rate changes would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Keywords: low income household; relative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一、引言

低收入群体普遍面临着生活质量低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的研究发现,城镇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生活质量较差,被动性消费在低收入家庭消费中占有相当比重^[1]。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还存在就业不稳定、家庭人口规模大、文化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2~4]。除上述研究之外,很多研究关注于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救助体系,认为公共救助体系不完善是导致低收入群体生活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秦丽娜的研究发现,我国城乡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制度存在制度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5]。张可成和王晓辉指出,尽管我国对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投入巨大,但是效果却不理想,究其原因是由制度因素所导致的逆向选择^[6]。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低、就业不稳定、文化水平低的现状以及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救助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中“低收入群体”概念却并不统一,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例如,秦丽娜将低收入群体定义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 50% 的群体^[7]。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将收入低于最低 20% 收入阶层人均消费支出的居民作为低收入居民^[8]。刘扬、赵春丽、邹伟将按照线性扩展支出系统计算出的贫困线乘以赡养系数作为划分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标准^[9]。孙兴玲则认为低收入群体等同于贫困群体^[10]。概念不同,那么它所指代的对象就会不同,基于不同研究对象而得出的结论就必然会不同。由于现有关于低收入群体研究对低收入群体概念定义不一致,这就导致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

鉴于现有低收入群体研究所存在的上述缺陷,本文力图对“低收入”概念加以界定,从而为有关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研究奠定基础。在确定概念之后,本文利用不同方法制定的贫困线计算了北京市相对贫困指数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然后,本文利用分解方法分析了贫困线变动、收入增长和不平等变动对北京市相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

二、低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在低收入群体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将低收入群体等同于统计意义上的低收入户。《中国统计年鉴》按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居民划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类。在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等级分类中,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占总户数的比例都为 10%,两者合计为 20%,所以大多数关于低收入群体的研究将统计意义上最低 10% 或者 20% 家庭作为低收入群体。例如,常兴华和王立剑便将统计学意义上的低收入户等同于低收入群体^[11~12]。统计意义上的低收入户仅仅是根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分类的结果。由于在分类过程中判断家庭收入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部分家庭可能与中等收入居民收入相比收入水平较低而被划分到低收入居民的行列,但是他们并不存在生活质量差、就业不稳定等低收入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家庭就不是研究中所指的低收入群体。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将统计意义上的低收入户等同于低收入群体加以研究,那么就扩大了低收入群体的范围,所以统计学意义上的低收入户并非研究中所指的低收入群体。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素,它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内涵和外延。内涵是一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它

是为一类对象全部所有并仅为这类对象所有的某种属性。概念的外延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类，它是具有概念内涵的所有对象所构成的类。只要确定了一个概念的内涵，那么该概念的外延也随之确定，所以确定一个概念就是要确定它的内涵。因而，确定“低收入”概念就是要确定低收入群体的本质属性。陈琳、丁烈云等的调查研究发现，广州市 59.9% 的低收入家庭住房过度拥挤；17.7% 的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危房之中；12.6% 的低收入家庭则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13]。王国辉、黄镜伊等的研究发现，城镇最低 40% 低收入灵活就业家庭完全不具备针对他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或者仅具备部分缴费能力^[14]。王延中和龙玉其指出，中低收入群体对健康问题比较重视，对医疗服务需求比较强烈，但是他们却不能从医疗机构获得医疗服务^[15]。从以上关于低收入群体现状描述可以发现，社会所认可的基本生活得不到满足是所有低收入群体都面临的基本问题，如住房、教育、医疗等。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并非出自于他们个人节俭的偏好，而是由于他们低且不稳定的收入水平。例如，王延中和龙玉其的研究表明，经济困难是中低收入群体无法从医疗机构获得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16]。由此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低而导致社会认可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是低收入群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所以低收入群体就是收入水平无法满足社会所认可基本生活的社会群体。

从概念来看，“低收入群体”概念接近于“贫困”概念，因为贫困居民或者家庭就是收入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家庭或者个人^[17]。与此同时，部分国家低收入研究的实践也可以佐证低收入群体就是贫困群体。费舍尔（Fisher）在对美国贫困线发展的研究中指出，美国普查局在 1971 ~ 1975 年间的报告中以“低收入”（low-income）来替代“贫困”（poverty）^[18]。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依然采用对低收入居民或者家庭的测算来代替对贫困居民或者家庭的测算^[19~22]。然而，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贫困概念内涵不同，所以它们所指代的社会群体也就不同。罗恩特里（Rowntree）在对贫困的研究中指出，绝对贫困就是收入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理需要所需的各种必需品^[23]。奥珊斯基（Orshansky）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收入不能充分满足其成员生存的营养需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那么这个家庭就处于绝对贫困之中^[24]。阿玛提亚·森认为，绝对贫困是由于消费权利组合不足以维持人基本生存的状态^[25]。由以上概念可以看出，绝对贫困是指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通过以上低收入群体现状研究可以看出，尽管低收入群体生活遇到住房、医疗等各种困难，但是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却能够得到有效保证，所以低收入群体与绝对贫困群体所指的对象并不相同。相对贫困家庭是指他们的收入不能维持他们从属社会所认可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26]。尽管低收入群体中绝对贫困之外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他们的收入却不能维持社会认可的最低生活标准，所以他们的生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如汤森德（Townsend）所指出：“他们（相对贫困家庭或者个人）拥有的资源严重低于社会一般家庭或个人的拥有量以至于他们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方式，无法遵循社会风俗，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27]。”从概念的内涵可以看出，“低收入”和“相对贫困”所指代的事物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他们都指收入水平不能维持社会认可的基本生活，所以低收入群体就是相对贫困群体。

三、贫困线和收入数据

1. 贫困线设定

既然“低收入”就是“相对贫困”，那么城镇低收入群体就是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所以测算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就是测算城镇相对贫困群体的规模。贫困测算主要包括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28~30]。贫困线设定是识别问题，它是贫困测算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对贫困线进行科学的设定，才能辨别出贫困人口，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贫困加总研究。因而，相对贫困线设定是对相对贫困群体进行测算的首要任务。相对贫困线制定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预算标准法、社会指标法、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收入法^[31]。收入法是以收入或者消费分布集中趋势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线。例如，以一个群体人均消费的 50% 或

者 60% 作为相对贫困线^[32]。利用收入法制定的绝对贫困线具有易于计算、具有国际可比较性等特点,所以这种相对贫困线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33-37]。然而,收入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它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与相对贫困概念并非完全吻合。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则是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 消费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制定相对贫困线。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认为,理性消费者在收入约束下首先满足生活中各种基本需要,然后将收入用于基本需要之上的生活水平提高^[38-39]。因而,只要计算出消费者满足各种基本需要的支出,就计算出了贫困线。

由于估计方法会对估计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所计算出的贫困线,所以本文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 和分位数回归 (RQ) 对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系数进行估计,这是因为分位数回归无需满足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条件,所以估计结果更为稳健^[40-41]。本文采用以收入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制定的贫困线作为测算相对贫困群体规模的相对贫困线。收入法制定贫困线中分别以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乘以系数 0.5 和 0.6 制定两条相对贫困线;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则分别用 OLS 和 RQ 两种方法估计相关系数而制定两条贫困线 (见表 1)。

2. 收入数据拟合

在贫困识别过程中除了要设定贫困线之外,还需要代表收入总体的样本数据。收入样本数据分为微观数据和加总数据两类,一般比较容易获得的是收入加总数据,如全国或者各省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就是加总数据。利用收入分组数据无法直接计算贫困群体规模,需要根据收入分组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推导出描述样本数据的收入分布函数,如此才能结合贫困线计算贫困指标。从方法上来看,收入分布函数拟合可以分为参数拟合和非参数拟合两种方法,上述两种方法中参数拟合方法要优于非参数拟合方法^[42]。因此,本文采用参数拟合的方法对收入分布函数进行拟合。具体而言,本文以对数正态分布函数为基础对洛仑兹曲线进行拟合来获得对数正态分布中的两个参数 μ 和 σ ,从而获得居民收入的对数正态分布函数。其中参数 μ 代表收入增长, σ 表示收入不平等。本文采用上述拟合方法对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城镇住户调查加总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出的参数如表 2 所示。

拟合出居民收入分布函数之后,就可以根据之前设定的相对贫困线来计算贫困指数。贫困指数种类繁多,而本文采用贫困研究中使用较多的 FGT 指数表示贫困程度。

$$FGT = \int_0^z \left(\frac{z-x}{z} \right)^\alpha f(x) dx, \alpha \geq 0 \quad (1)$$

在式 (1) 中, z 代表贫困线, x 代表贫困者的收入水平, $f(x)$ 表示居民收入的概率密度函数。当 $\alpha = 0$ 时,FGT 指数表示贫困率 (poverty rate); 当 $\alpha = 1$ 时,FGT 指数表示贫困缺口率 (poverty gap ratio); 当 $\alpha = 2$ 时,FGT 指数表示贫困强度指数 (squared poverty gap)。

表 1 1997 ~ 2011 北京市城镇相对贫困线 元

年份	IP - 1	IP - 2	ELE-OLS	ELE-RQ
1997	3265.90	3919.08	3846.25	3559.86
1998	3485.40	4182.48	4440.50	4525.00
1999	3749.25	4499.10	4478.97	4571.11
2000	4246.75	5096.10	6292.20	5116.73
2001	4461.35	5353.62	6273.52	6411.61
2002	5142.90	6171.48	8115.54	7790.75
2003	5561.90	6674.28	6149.42	6513.22
2004	6100.20	7320.24	7858.93	8405.43
2005	6622.10	7946.52	8318.29	8827.17
2006	7412.50	8895.00	9011.40	10311.13
2007	7665.00	9198.00	9543.59	9917.26
2008	8230.00	9876.00	8905.72	9141.60
2009	8946.50	10735.80	10367.47	10244.54
2010	9967.00	11960.40	11158.56	11986.55
2011	10992.00	13190.40	9609.06	10976.76

注: IP - 1 表示以人均消费乘以 0.5 作为贫困线; IP - 2 表示以人均消费乘以 0.6 作为贫困线; ELE-OLS 表示用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值计算的贫困线; ELE-RQ 表示用分位数回归法估计值计算的贫困线。下同。

表 2 对数正态分布拟合参数

年份	σ	μ	年份	σ	μ
1997	0.28	8.92	2005	0.39	9.70
1998	0.30	9.00	2006	0.37	9.83
1999	0.30	9.08	2007	0.39	9.92
2000	0.32	9.19	2008	0.42	10.03
2001	0.34	9.30	2009	0.41	10.11
2002	0.38	9.36	2010	0.38	10.20
2003	0.39	9.46	2011	0.40	10.32
2004	0.40	9.58			

四、城镇低收入群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

1997~2011年间北京市的FGT指数如表3所示。通过对不同贫困线下所计算出的贫困率、贫困缺口率和贫困强度指数大小的比较可以发现,贫困线选择对贫困指数大小具有重要影响。例如,IP-1、IP-2、ELE-OLS和ELE-RQ作为贫困线计算出的相对贫困率中位数分别为0.58%、2.07%、2.44%和2.82%。与此同时,扩展线性支出法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也会影响贫困指数的大小,从表3可以看出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下的贫困指数总体要大于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下的贫困指数。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贫困线制定方法以及相同方法下不同的估计方法都会对测算结果产生影响,所以贫困线选择在贫困测算中具有重要地位。从表3中可以看出,IP-1、IP-2、ELE-OLS和ELE-RQ作为贫困线计算出的相对贫困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5%、1.24%、4.4%和3.81%,所以扩展线性支出法贫困线所计算的贫困指数的标准差要大于收入法贫困线所计算出贫困指数的标准差,这说明扩展线性支出法贫困线所计算出的贫困指数的离散性要大于收入法贫困线。因此,贫困线选择会影响到贫困指数的离散程度。总之,贫困线选择不仅会影响到贫困指数的大小,而且它还会影响贫困指数的离散程度。具体到北京市而言,目前其低收入群体相对规模较小。在不同的贫困线下2011年北京市相对贫困率分别为0.58%、1.93%、0.22%、0.58%(见表3)。北京市相对贫困率的总体变动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低水平徘徊阶段(1997~2000)。从1997~2000年期间,贫困率处于低水平徘徊。1997年以如果以IP-2计算出的贫困率为1.06%。截至2000年,以IP-2计算出的贫困率为2.07%。由此可见,尽管贫困率有所上升,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第二阶段,上升到较高水平(2001~2004年)。以IP-2为贫困线所计算的贫困率由2001年的1.87%上升到2002年的4.99%。到2004年,北京市城镇相对贫困率仍然维持在4.29%。第三阶段,逐渐下降(2005~2010年)。在这一阶段,北京市相对贫困率由之前的较高水平逐渐下降到较低水平。例如,2010年以IP-2作为贫困线计算的相对贫困率为1.71%。尽管在扩展线性支出法和收入法下贫困率表现出较为相似的变动趋势,但是年度贫困率变动仍然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变动速度和方向的差异(见图1)。例如,2006年以IP-1、IP-2和ELE-OLS作为贫困线所计算的贫困率比2005年下降了26.6%、20.53%和33.84%,而以ELE-RQ作为贫困线所计算的贫困率却比2005年上涨了4.8%。由此可以看出,贫困线对贫困指数短期变动趋势具有显著影响。

表3 北京市FGT指数

年份	贫困率 (%)				贫困缺口率 (%)				贫困强度指数 (%)			
	IP-1	IP-2	ELES-OLS	ELES-RQ	IP-1	IP-2	ELE-OLS	ELE-RQ	IP-1	IP-2	ELE-OLS	ELE-RQ
1997	0.16	1.06	0.89	0.41	0.12	0.94	0.77	0.33	0.02	0.14	0.12	0.05
1998	0.28	1.51	2.44	2.82	0.24	1.49	2.53	2.98	0.04	0.25	0.44	0.53
1999	0.23	1.30	1.26	1.49	0.19	1.25	1.19	1.45	0.03	0.20	0.20	0.24
2000	0.46	2.07	8.31	2.13	0.42	2.22	10.80	2.29	0.07	0.40	2.28	0.42
2001	0.45	1.87	5.27	5.99	0.43	2.09	6.73	7.80	0.07	0.39	1.41	1.66
2002	1.69	4.99	17.63	15.00	2.07	6.98	30.83	25.32	0.42	1.59	8.36	6.69
2003	1.66	4.79	3.05	4.20	2.08	6.81	4.08	5.87	0.43	1.58	0.90	1.34
2004	1.47	4.29	6.20	8.55	1.82	6.05	9.20	13.38	0.38	1.40	2.21	3.35
2005	0.94	3.02	3.93	5.42	1.09	3.97	5.34	7.72	0.21	0.86	1.19	1.79
2006	0.69	2.40	2.60	5.68	0.75	2.99	3.27	7.92	0.14	0.62	0.68	1.80
2007	0.55	1.93	2.42	3.05	0.61	2.40	3.10	4.01	0.11	0.50	0.66	0.87
2008	0.79	2.40	1.31	1.53	0.97	3.30	1.68	2.00	0.20	0.75	0.36	0.44
2009	0.72	2.25	1.83	1.71	0.87	3.03	2.42	2.23	0.18	0.68	0.53	0.49
2010	0.48	1.71	1.08	1.73	0.52	2.10	1.26	2.13	0.10	0.43	0.25	0.44
2011	0.58	1.93	0.22	0.58	0.67	2.5	0.2	0.67	0.13	0.54	0.042	0.13
中位数	0.58	2.07	2.44	2.82	0.67	2.50	3.10	2.98	0.13	0.54	0.66	0.53
标准差	0.50	1.24	4.40	3.81	0.65	1.94	7.64	6.49	0.14	0.48	2.07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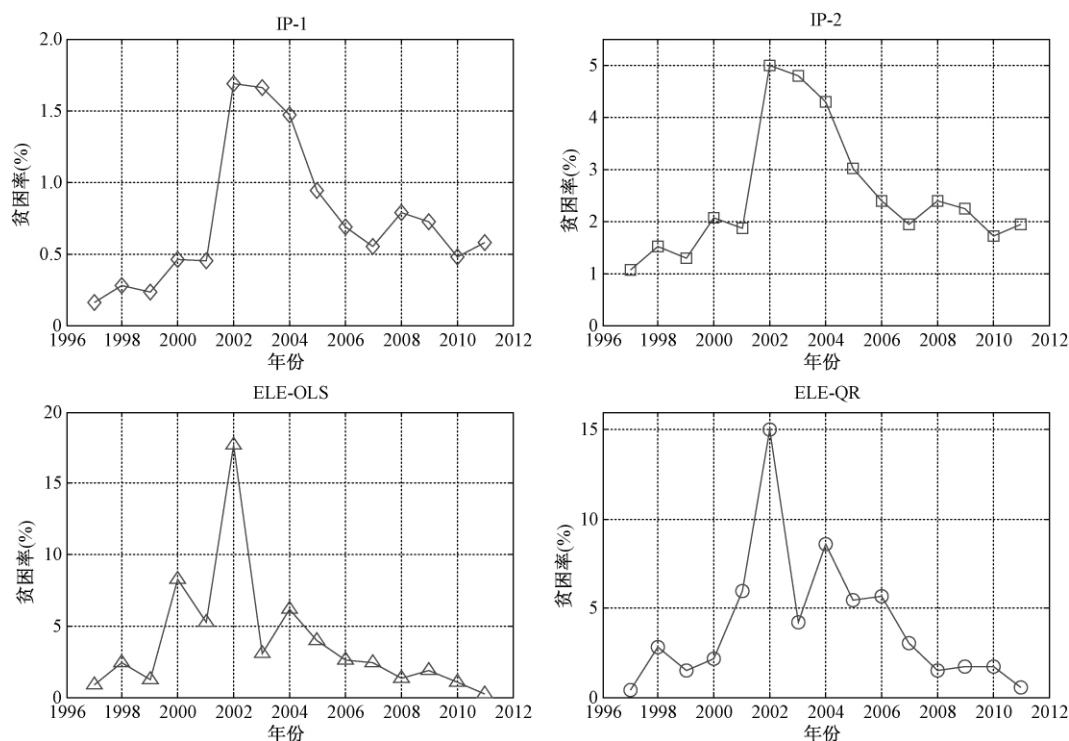


图1 1997 ~ 2011 年北京市贫困率

五、城镇低收入群体变动的影响因素

从式 (1) 可以看出 FGT 指数由贫困线 z 和居民收入概率密度函数 $f(x)$ 共同决定, 而对数正态分布函数的概率密度函数是由参数 μ 和 σ 共同决定, 所以 FGT 指数就由贫困线 z 和参数 μ 及 σ 共同决定 $p = p(z, \mu, \sigma)$ 。假定基期和比较期的贫困率为 p_0 和 p_1 , 两期的贫困率差别为 Δp , 则:

$$\begin{aligned} \Delta p &= p_1 - p_0 = p(z_1, \mu_1, \sigma_1) - p(z_0, \mu_0, \sigma_0) \\ &= p(z_1, \mu_1, \sigma_1) - p(z_0, \mu_1, \sigma_1) + p(z_0, \mu_1, \sigma_1) - p(z_0, \mu_0, \sigma_1) + p(z_0, \mu_0, \sigma_1) - p(z_0, \mu_0, \sigma_0) \end{aligned} \quad (2)$$

式 (2) 的第 1、2 项之差表示的是贫困线变动所导致的贫困率变动; 第 3、4 项之差表示的是收入增长所导致的贫困率变动; 第 5、6 项表示的是收入不平等变动所引起的贫困率变动。由此可以看出, 贫困率变动可以分解为贫困线变动项、收入增长变动项和收入不平等变动项三个部分。

表 4 显示了按照分位数回归方法估算和人均消费乘以 0.6 两种贫困线下贫困率变动的分解结果。无论选用哪种贫困线, 收入增长所引起的贫困率变动都为负。例如, 2011 年收入增长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分别为 -1.132 和 -1.119。收入增长所导致的贫困率的负增长表明北京市的收入增长有效降低了城镇贫困率。除个别年份之外, 北京市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提高 (见表 2)。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引起了贫困率的增加, 例如 2011 年由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动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为 0.449。由此可以看出,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北京市贫困率的上升。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在分位数回归扩展线性支出法贫困线下, 部分年份贫困线变动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为负, 如 2003、2007、2008 和 2011 年, 因为这些年分位数回归扩展线性支出法贫困线都出现了下降 (见表 1)。除此之外, 两种贫困线变动都导致了贫困率增加, 这说明贫困线增高导致了北京市贫困率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 收入增长降低了北京市的贫困率, 而贫困线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则增加了北京市的贫困率。

表4 北京市贫困率变动分解结果

年份	ELE-QR				IP-2			
	总变化	贫困线	收入增长	收入不平等	总变化	贫困线	收入增长	收入不平等
1998	2.408	2.467	-0.360	0.301	0.449	0.648	-0.770	0.571
1999	-1.325	0.123	-1.288	-0.159	-0.208	0.625	-0.726	-0.106
2000	0.641	1.261	-1.264	0.643	0.766	1.308	-1.133	0.591
2001	3.861	4.654	-1.489	0.696	-0.203	0.566	-1.454	0.684
2002	9.003	8.888	-2.099	2.214	3.128	2.809	-0.942	1.260
2003	-10.794	-5.962	-5.494	0.661	-0.204	1.679	-2.357	0.474
2004	4.348	6.344	-2.108	0.113	-0.500	1.739	-2.359	0.121
2005	-3.127	1.261	-3.811	-0.576	-1.270	1.193	-2.047	-0.416
2006	0.256	3.394	-2.609	-0.528	-0.621	1.267	-1.509	-0.379
2007	-2.634	-0.766	-2.424	0.556	-0.475	0.373	-1.199	0.351
2008	-1.517	-0.923	-1.807	1.213	0.470	0.809	-1.279	0.941
2009	0.178	0.875	-0.566	-0.131	-0.146	0.884	-0.853	-0.177
2010	0.026	1.148	-0.564	-0.558	-0.540	0.887	-0.748	-0.679
2011	-1.155	-0.476	-1.132	0.453	0.220	0.890	-1.119	0.449
中位数	0.102	1.204	-1.648	0.377	-0.204	0.888	-1.166	0.400
标准差	4.470	3.568	1.384	0.764	1.027	0.633	0.566	0.557

在两种贫困线下，贫困线、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动对贫困变动贡献的中位数分别为 1.204、-1.648、0.377 和 0.888、-1.166、0.400。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增长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最大；贡献率大小仅次于收入变动的是贫困线变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动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最小。从以上的中位数可以看出，线性扩展支出法贫困线下贫困线变动和收入增长对贫困率的变动贡献要大于收入法贫困线下它们对贫困率的贡献，而线性扩展支出法贫困线下收入不平等对贫困率变动贡献要小于收入法贫困线下对贫困率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贫困线选择对于贫困线变动、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动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具有影响。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低收入群体实际上就是相对贫困群体，所以对低收入群体规模的测算也就是对相对贫困群体规模的测算。其次，通过对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测算发现，贫困线选择会对贫困指数大小、离散程度产生重要影响。贫困线选择会对贫困线、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贡献大小产生重要影响。不同贫困线所计算出的贫困指数在长期表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但是年度贫困率变动却存在较大差异，既包括变动方向也包括变动速度。因此，贫困测算中应该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线，否则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谬误。最后，通过对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收入增长降低了北京市的相对贫困率，而贫困线的上移和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则提高了北京市的相对贫困率。从贫困线、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小来看，收入增长对北京市贫困率变动贡献最大；贫困线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大小仅次于收入增长；收入不平等变动对贫困率变动的贡献最小。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 低收入群体保护: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J]. 统计研究, 2002, (12).
- [2] 同 [1].
- [3] 常兴华. 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问题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2001, (4).
- [4] 谢勇, 李放. 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 [J]. 人口与经济, 2007, (4).
- [5] 秦丽娜. 我国城乡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制度问题及对策建议 [J]. 经济师, 2009, (7).
- [6] 张可成, 王晓辉. 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制度研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 (11).
- [7] 同 [5].
- [8] 同 [1].

- [9] 刘扬, 赵春雨, 邹伟. 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问题研究——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思考 [J]. 经济学动态, 2010, (1).
- [10] 孙兴玲. 我国低收入群体消极心态的成因与改善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6, (6).
- [11] 同 [3].
- [12] 王立剑. 城镇低收入人群社会救助需求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州、深圳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0, (5).
- [13] 陈琳, 丁烈云, 谭建辉等. 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特征与住房保障研究——来自广州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10, (10).
- [14] 王国辉, 黄镜伊, 王利军等.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养老保险缴费压力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1, (6).
- [15] 王延中, 龙玉其. 中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需求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基于 1642 户中低收入家庭调查 [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0, (3).
- [16] 同 [15].
- [17] Bradshaw, J., Gordon, D., Levitas, R., et al. Perceptions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M]. University of Bristol: Townsen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search; Bristol, 1998.
- [18] Gordon, M. Fisher.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the Poverty Thresholds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92, 55 (4).
- [19] Brian Murphy, Xuelin Zhang & Claude Dionne. Low Income in Canada: A Multi-line and Multi-index Perspective [R]. Income Research Paper Series. Ottawa; Statistic Canada, 2012.
- [20] Income Statistics Division Statistic Canada. Low Income Lines, 2008 – 2009 [R]. Income Research Paper Series. Ottawa; Statistic Canada, 2010.
- [21] Philip Giles. Low Income Measurement in Canada [R]. Income Research Paper Series. Ottawa; Statistic Canada, 2004.
- [22] Zhang, Xuelin. Low Income Measurement in Canada: What Do Different Lines and Indexes Tell Us? [R]. Income Research Paper Series. Ottawa; Statistic Canada, 2010.
- [23] Rowntree, B. S., B. S. Turner.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 London: Macmillan, 1902.
- [24] Mollie, Orshansky.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65, 28 (1).
- [25]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6] Peter,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27] 同 [26].
- [28] Amartya, Sen.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J]. Econometrica, 1976, 44 (2).
- [29] Amartya, Sen.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81 (2).
- [30] 张建华, 陈立中.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J]. 经济学, 2006, (3).
- [31] 池振合, 杨宜勇. 贫困线研究综述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 (7).
- [32] Christophe, Muller. Defining Poverty Lines as a Fraction of Central Tendency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6, 72 (3).
- [33] 同 [19].
- [34] 同 [22].
- [35] Jarvis, Sarah & Jenkins, P. Stephen. Low Income Dynamics in 1990s Britain [J]. Fiscal Studies, 1997, 18 (2).
- [36] 罗云梅, 林燕, 张菊英等. 四川省农村低收入人口门诊费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现代预防医学, 2011, (14).
- [37] Pedersen, P. J. & Smith, N. Low Incomes in Denmark, 1980 – 1995 [R].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Denmark; University of Aarhus and the Aarhus School of Business, 1998.
- [38] Lluch, Constantino. 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3, 4 (1).
- [39] Stone, Richar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s and Demand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tern of British Demand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4, 255 (64).
- [40] Koenker, R. & Bassett Jr, G. Regression Quantiles [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8, 46 (1).
- [41] 李育安. 分位数回归及应用简介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6, (3).
- [44] Minoiu, Camelia. Poverty Analysis Based 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from Grouped Data [R]. Columbi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nd Policy Working Paper, 2006.

责任编辑 方 志